

世界  
传媒  
大师  
系列

他一生活了85岁，其中持续写作60余年，  
创作1000余万字；  
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  
然而他却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  
他是美国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 李普曼传

[美] 罗纳德·斯蒂尔◎著  
于滨 陈小平 谈锋◎译  
谈峰◎校译

Walter Lipper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1820664

Walter Lipper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 李普曼传

[美] 罗纳德·斯蒂尔◎著  
于滨 陈小平 谈锋◎译  
谈锋◎校译



K837.125.12  
L465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普曼传 / (美) 斯蒂尔著; 于滨, 陈小平, 谈锋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11

书名原文: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ISBN 978-7-5086-1233-1

I. 李… II. ① 斯… ② 于… ③ 陈… ④ 谈… III. 李普曼, W. (1889~1974) —传记  
IV. K837.125.34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5049号

Walter Lipper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y Ronald Steel

Copyright©1980 by Ronald Stee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 李普曼传

LIPUMAN ZHUAN

---

著 者: [美] 罗纳德·斯蒂尔

译 者: 于 滨 陈小平 谈 锋

校 译: 谈 锋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557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3585

书 号: ISBN 978-7-5086-1233-1/F·1386

定 价: 68.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 “世界传媒大师”丛书 ·

## 出版总序

赵凯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一直到今天，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力量中，新闻和舆论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样的特点在传媒业发达的欧美国家更加鲜明。而舆论和新闻的力量所仰仗的便是一份份独立思考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或是今日盛行的互联网。它们虽然并不指挥千军万马，却拥有引导民心所向的强大力量，正如范长江所言：“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这其中，尤以那些大师级的传媒人为甚，他们往往是一个媒体的思想核心，也成为万千人众的偶像。

从上世纪初开始，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为这批传媒人的诞生提供了适合生长的温润土壤。在欧美等国，一批激进的思想者，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受众的需要，或办起了一份份报刊、电台、电视台，或发表洛阳纸贵的报道、评论，将欧美社会引入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新闻时代。这群人中有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有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也有美国著名的新闻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华盛顿邮报》女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等等，他们叱咤风云，不仅仅影响了那个时代，即使今天也回响未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正在行进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世界传媒大师的人生道路中寻求我们所需要的养分。因此藉以通过系列丛书的形式，将这些大师们的传奇经历跃然纸上，以飨中国读者。

## · 中文版序一 ·

# 新版缘起

吴晓波 蓝狮子出版人、财经作家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位诺贝尔奖得主、7位美国总统，他们在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30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将近20年前，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土中。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他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伟大的美国记者，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1.4万篇专栏，对于当年的很多美国人来说，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房门，捡起牛奶瓶和报纸，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李普曼是怎么评论这个世界的。他结交了地球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要，他让记者成为了一项“仅次于总统的职业”，有人甚至认为，他的素养足以担任美国总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缥缈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

《震撼世界的10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地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身无法摆脱。我常常会很好奇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形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我还常常记忆起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过的一段话，那是在1959年9月22日，他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的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无比的坚定心，他说：“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然后这些理论和假设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道，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相信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读到过这段文字。20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于是，李普曼成了很多传媒人成长的“私人记忆”之一。

对罗纳德·斯蒂尔这本厚厚的李普曼传记的引进，是我创办蓝狮子时就已萌生的念头。2005年底，我委托九久读书人公司的彭伦洽谈有关事宜，我很快得知，本书的1982年中文版并没有得到任何授权，而没有人知道版权到底在谁的手上。又过了一段时间，彭伦突然得悉，罗纳德·斯蒂尔尚在人世，他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而版权已经从图书公司转回到了他的手上。彭伦尝试性地给他发去了电子邮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找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接下来就是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就在我们都已经有了一点绝望的时候，斯蒂尔的回信突然来了，他对自己的图书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在遥远的中国出版非常吃惊，甚而有点不满。所以，对授权事宜表现得非常之谨慎，他派出一位中国朋友到上海与彭伦接洽谈判，授权合同几经修改。与此同时，新版本的翻译也进行得不太顺利，我们数度努力，找到了原来的译者，但三位译者如今尽数留洋美国，联络颇为不便，几经努力，我们找到原译者中的谈锋先生，1989年赴美的他再度拾起旧作时，又有了新的体会，因此我们请他进行重新校译，但因文字量巨大，这项工作也占去了很长的时间。就这样，在历经了两年多的周折后，此书终于由中信出版社再度出版。

而在时隔26年之后，“李普曼”再度归来，“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

## · 中文版序二 ·

# 理智与情感

许知远 《东方企业家》主笔

傍晚五点，适合在图书馆里闲荡。人们正在散去，涌向最近的学三食堂。书架很高，我要踮起脚来才够得着最上的一排。我喜欢看那些排列在一起的书籍，端庄、沉默。它们大多被包装上了黑色的硬壳封皮、扉页上盖上了深红色的印章，上面是篆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并被统一编了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寻找书中磁条的位置，如果取下它，你就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地通过门口的测试器。偷书，就像看高年级女生的大腿一样，是我们大学时光中永远难以压制的欲望。

我从历史类的书架，转到了传记类，扫过一排排显赫一时的名字，停留在《李普曼传》上。我从书架上取下了它，只是出于对陌生名字的好奇。那时我正乐此不疲地收集人名、书名，仿佛它们是通向一个丰沛、广博世界的捷径。潜意识中，我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我22岁了，仍不知该以何为业，期待别人的生活能给我启示。

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我的住所从28楼的宿舍，转移到北大东门的筒子楼，西郊的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房间，还有此刻的紫竹院，它一直静静地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1984年新华出版社的版本，包装朴素、翻译精良，售价不过2.60元，图书馆的编号是K837.1254/2。

我记得那个闹哄哄的夜晚，我边吃着食堂的鱼香肉丝，一边屏住呼吸读完了56页。“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24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85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持续了60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1 000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30多本著作。”这段毫无色彩的



简介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职业模式吗——以言论为业，高产，创作生命漫长，很早进入舞台中央，并将影响力持续到生命终止……

那真是个一相情愿的年纪，我丝毫不理会主人公所成长的国家与时代，不想了解他内心的挣扎与绝望，只期待能复制他的名声与影响力。他评论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对赫鲁晓夫、戴高乐提出外交建议，和威廉·詹姆士、弗洛伊德、凯恩斯、萧伯纳讨论问题，他以镇定自若的口气教育几代美国人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

这本传记就像个迷人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变化，我开始欣赏她的不同特质。大学三年级时，我一口气读完了前56页，因为它主要是李普曼的大学生涯，那是1910年的哈佛，李普曼和他的同学们致力于探讨和实践各种新思想，他们创办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凌晨一点的街头争吵，在《哈佛月刊》写出这样的句子：“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就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我还倾慕那样的时刻，年迈的威廉·詹姆士在早晨敲响19岁的李普曼的宿舍门，告诉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多么的好。哪个青年不期待在人生刚刚展开时，有一个强有力、值得信任的前辈的指引呢？

毕业时，我成为了一名记者，李普曼创办《新共和》的故事，开始被我不断地重读。我总是在对别人说，要用一种新知识的精神，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并描绘她的未来。这种话语不正是赤裸裸地借用自李普曼和他的同伴们对《新共和》的定义吗？连我那不可救药的进步主义情结，也来自那时代。艺术家、作家、政治人物、花花公子、流浪汉，都沉浸于一种乐观情绪中，相信他们将寻找到一种新方式来缔造一个新社会，李普曼寻找的角度是政治评论，就像他自己写道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它。我们是争取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动力”。我总在想象那样的画面，“他们一边吃面条，喝廉价的果子酒，整夜整夜地辩论精神分析学和社会主义问题。”

我的阅读在此后就开始停滞了，罗纳德·斯蒂尔这本传记英文原名直译过来是《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其中大量篇幅在描绘分析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它正是李普曼成就的重心。但在好几年中，对此缺乏兴趣。令人发笑的是，当我开始为一家报纸撰写国际政治评论时，我开始经常提到李普曼，但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只言片语。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在一本普利策奖的作品集中，读过他的一两篇关于苏联的评论，但它们没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所以，我关于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这本传记。他在这阶段给我的至深影响是他对于大众的怀疑，他对于深入分析的钟爱，他不信任那些沉湎于事实揭露的新闻记者，他像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大众报纸上写作，而不顾及是否读者能够理解，还有他对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控制不住的喜爱……他的这些洞见（或者偏见）都深深地植入了我刚刚开始

的写作。

李普曼在青年时代的进步与乐观情绪，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自身年龄

的增长，在1920年代开始幻灭，他变得更谨慎、不动声色。而我对国际政治的热忱在4年后变得意兴阑珊。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接近事件的核心或者权力人物，那种借助二手、三手资料再做综合性的分析，像是一个自我沉溺的文字游戏，它没什么影响力。但即使如此，这本《李普曼传》还是经常进入我的视野。在一些突然心灰意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焦虑的时刻，我会在再度翻起它。

我开始喜欢阅读他的爱情故事。在他的过度冷静的外表下，是一颗孤寂的心。结婚多年的他爱上了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并最终和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他1937年5月给这位新情人的信中写道，“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是我看到的最动人的情书了，或许那天下午他仍在评论欧洲的最新局势。

我也开始喜欢他的晚年时光。到达声誉的顶峰之后，他的身体、思维和名声开始不可避免的下滑。一个终身依靠清晰逻辑生活的人，必须要习惯头脑的逐渐混乱，手不停笔的写作了60年之后，他发现自己难以把握那些词句了……但是，即使在周围世界正在坍塌时，他仍竭力保存那一贯的自尊。在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葬礼前两天，他一直在房间里练习行走，他不愿意在葬礼上以坐轮椅的方式出现。对于这个场景，罗纳德·斯蒂尔写道：“他瘦得出奇，漂亮的颧骨突出在松弛的皮肤下，他形销骨立，黑色上衣在身上晃晃荡荡。他看起来极为孤单……但他蔑视这种帮助。”

距离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的发现，将近10年过去了。看起来，它还会再伴随下一个10年。令我兴奋的东西逐渐开始转移，如今我越来越期待知道这样一个热衷于秩序、高度理性人，是如何控制内心深层的矛盾感的，他怎样对待自己的犹太身份的；一个恪守传统道德原则的人，是如何接受那段惊世骇俗的恋情的，他是如何在独立性和对权力的钟情中找到平衡的……

我像描述一段恋情一样，回顾了我和一本书的关系，我甚至不记得它有什么缺点。这种絮叨，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或许远大于对于读者的启发。

这是我对这本再版的《李普曼传》的序言。对于一生献给公共写作的传主来说，这样的介绍是一种显著的不协调，这种矛盾也存于传主的公众形象与真实的内心之间，它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探索。

## 译者的话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24岁（1913年）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85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延续了60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1 000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著述出版了30多本著作。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36年（1931~1967），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这些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载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200多家报纸上，受到美国政府以及各国首脑和外交机构的高度重视。

李普曼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一生中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观点。此外，他与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赫鲁晓夫、尼赫鲁、墨索里尼等首脑人物都有直接的接触。正如本书作者罗纳德·斯蒂尔所说：“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称李普曼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本书对李普曼的个人经历、性格特点、新闻生涯、著作要点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论述，但它绝不仅仅是李普曼个人的传记，它对一个世纪来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事务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故原书名为《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美国的内政外交、美国新闻史以及新闻界与政府的关系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本书已被评为美国1980年最佳非虚构类畅销书之一。

全书共分两部分。上部是从1889年到1931年，记叙了李普曼的早年生活、求学经历以及在报界的生涯。下部是写他从1931年开始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在全国一举成名，一直到1974年逝世。这一阶段是李普曼政治生活最为活跃、建树最多、个人生活最富戏剧性的时期。

本书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生于伊利诺伊州，早年求学于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先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现为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尔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事务方面颇有论著，并出版了《联盟的终结：美国 and 欧洲的未来》、《和平的美国》及《帝国主义者和其他英杰》等著作。

## ·序·

# 赫赫声名开万户

一旦你触及到人们的传记，那种认为政治信仰必然固定不变观念就立即烟消云散了。

——《政治序论》1913年

沃尔特·李普曼的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歌舞升平的年代。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的进步似乎前途无量、势不可当；在那些日子里，诗人们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科学允诺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悠闲自在、丰衣足食。李普曼的生涯结束时，伴随着他的却是越南战争的创伤、水门事件的耻辱和街头横冲直撞的闹事者。李普曼的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又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19世纪9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还是一名小童，他就同麦金莱总统握过手，他被正式引见给海军上将杜威，他曾为西奥多·罗斯福从圣胡安山战役凯旋归来而欢呼雀跃。后来，他在哈佛就读于桑塔亚纳门下，同威廉·詹姆斯饮茶叙谈，他为林肯·斯蒂芬斯跑腿办事，同萧伯纳和H·G·韦尔斯辩论社会主义。1914年，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时，他正在那里；英国向德国宣战时他正在英国下议院。他一度对西奥多·罗斯福崇拜得五体投地；他25岁时，西奥多·罗斯福宣称他为“全美国同龄人中最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李普曼是《新共和》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他成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知己、豪斯上校的心腹；他是为“十四点计划”起草领土部分条款的秘密班子关键成员。

李普曼热情支持这场战争，以使世界能确保“民主的安全”；他猛烈谴责那种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孕育着更可怕冲突的和平。他成了当时最伟大的报纸——普利策的《世界报》的总编辑，这家报纸是美国自由主义良知的喉舌。他高踞于公园路的高楼之中，一群秘书为他屏障着电话铃声和吵吵嚷嚷的记者们的干扰。在

9年多的时间里，他手不停笔，写出了许多言辞锋利的社论，使他在全美一举成名。这些社论没有一篇是署名发表的，也几乎没有一篇至今被人铭记在心，但是对《世界报》的热心的读者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署名，因为这些社论都带着它们自己独特的印记。

然而，李普曼绝不是隐姓埋名之辈。他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在外旅行，而且气派很大，他同各国的元首交谈，他们也经常找上门来，热切盼望能荣幸地受到他的采访，因为他左右着如此众多忠实的和影响巨大的读者。正如李普曼的同事有一次所说，“他是赫赫声名开万户”。例如，50年代中期，李普曼访问希腊时，曾在他的日程本上草草记下几笔，“见了国王、首相，等等——都是些常见的人物”。对他来说，他们确实是常见的人物。李普曼不愿意抢先发表新闻，也瞧不起那种精心策划的“泄露消息”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评论家所不齿的。他在专栏文章中对各种事件的意义条分缕析，这些专栏文章都是各国总理府、外交部和编辑部的必读材料。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家主要报纸上。1967年当他半退休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形成制度的做法突然停止了存在。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非一贯正确，也并非广得人心；他并非多见的一些失言（如他以前曾把富兰克林·罗斯福贬为一个徒有好心的花花公子）是令人难忘的；他偶而有之的一些敌意（如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同林登·约翰逊结下的不和）也是引人注目的。

读者们求教于李普曼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他有一种化繁为简的非凡本领。他的卓著成就可归功于两种品质：一是他的头脑能够冲破纷争竞争的迷雾把握住形势的本质，二是他的文体极为清晰明了。他所具有的那种智力几乎不会使他对新闻工作感兴趣，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或是一个历史学教授，甚至像他有一次曾想入非非的那样，成为一个数学家。在大学里，他曾是桑塔亚纳的助手；同班同学约翰·里德曾为李普曼起哄，称他为美国未来的总统。

然而李普曼既不愿意成为政治家，也不愿意当教授。就在他即将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前几个星期，他离开了哈佛，去波士顿一家新创办的社会党报纸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同政客们共事；经历了这段痛苦的际遇之后，他也不会严肃认真地瞩目宦途。李普曼为什么脱离了学术界？其原因之一，是他唯恐这种学术生涯会把自己同他渴望投身其中的“现实的”世界相隔绝。他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喜爱这过程中的魅力和激情。然而政治生活，尤其是意味着为宦海沉浮而奔波，这对一个如此不信任情感和如此憎恶伪善虚假的人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李普曼固然也为自己声名卓著和影响日隆而怡然自得，但是他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去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又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他独具一格的统一。诚如他有一次对自己的描述那样，他

是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一是著书立说，一是从事报业，两者相得益彰。这种结合使他独树一帜，使他的言论带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

李普曼以一个新闻记者而自豪。他奖掖后进，呵护年轻记者。他倾听他们的由衷之言，而不是对他们颐指气使。对他这样一个单枪匹马进行工作的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同事们就是他的编辑部。他唯一给他们的忠告就是要他们避免“过从甚密”的危险性，即一个新闻记者如果同一位政治家过于亲密，就会丧失其客观立场。这在李普曼身上已有先例。他与西奥多·罗斯福过于密切，又吃足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苦头；他曾一度被约翰·肯尼迪强烈吸引，其后又被林登·约翰逊欺诈手段的魅力所迷惑，直至越南战争把约翰逊的魅力击得粉碎。

李普曼的影响是他的全部法宝，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一位强有力的公众人物。这种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但却又难以估量。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反过来又赋予他有权去影响总统、政治家和决策人物。当然，他们并不常常依照李普曼的忠告行事，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倾听他的意见，寻求他的支持，而且他们已经懂得不能对李普曼的反对意见掉以轻心。李普曼统御着一大批忠心耿耿而权势可观的群众，这是美国大约一千万在政治上最为积极和旗帜鲜明的人。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读到沃尔特·李普曼就当天发生的事件所发表的意见之前，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考虑这些问题。一个政治家除非是要自冒风险，他是不会对这股力量置之不理的。

李普曼作为一个像奥林匹亚神那样超然物外的人而声誉卓著，人们认为他像是雷神朱庇特，动辄打下霹雳雷电，但是过于谨小慎微，而不愿纡尊降贵地参与政治纷争。他的这种声誉，就像其他很多人的声誉一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事实上，李普曼已经促成了一大批人获得公职，并且还积极活动，挫败了另一批人。他时而在报上公开行动，时而在幕后秘密谋划，其手段方式若为读者们所知，定会令他们大惊失色。李普曼是一个奥林匹亚神，他在公众生活中具有端正的品行和坚定的道德感，然而他无疑不是超然物外的。

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他的秘密谈判使墨西哥革命领导人同梵蒂冈之间能够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为约翰·戴维斯、艾尔·史密斯、德怀特·莫罗和牛顿·贝克撰写政治发言稿，后来又为温德尔·威尔基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做准备，他同杜勒斯兄弟们密谋策划，他同肯尼迪、约翰逊商讨切磋。他的象牙之塔中装备着高速电梯。

毫无疑问，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正如范·威科·布鲁克斯有一次所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献身于政治写作的美国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但是李普曼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沃尔特·李普曼：一个李普曼在一家周刊杂志、一家报纸、最后是在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上发表文章，从未耽误过一次截稿期；另一个李普曼在他的“沉默的深渊”中思索，为“更为久远的过去和更为遥远的未来”冥思苦想。

就其本质而言，李普曼是个理性之人，一个启蒙运动的唯理论者，生活在一个炽热的意识形态和全球性的改革运动的年代，他同样也受到激情的冲击。他那瘦削冷峻的面庞、轮廓分明的漂亮嘴唇和闪烁着紫色光点的灰蓝色眼睛，略微透露出一丝痕迹，告诉人们此人在他的不惑之年曾经经历过狂风急浪般的爱情，这爱情驱使他走到了绝望的边缘。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他唯有用钢铁般的意志才能把这种情感加以控制。

李普曼的晚年标志着他的工作达到了一个奇特的顶点。他不是作为美国新闻界的一名元老悠然地抽身引退，而是卷入了他生涯中谩骂攻击空前激烈的战斗。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使得他义愤填膺，他转而激烈地反对政府，这个政府的最高层集团正是由那些曾对他赞赏备至和阿谀奉承的人们组成的。李普曼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投身于这场把美国分裂为好几个虎视眈眈的阵营的斗争。

及至耄耋之年，沃尔特·李普曼又重新萌复了他的青春激情。他背弃了他在30年代曾经信奉过的保守主义，也背弃了他曾经用以鄙视40年代末和50年代种种蠢举的精神上的超然态度。越南战争重新点燃了他的义愤感。这段时间或许是他的鼎盛年华。

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李普曼一直在锲而不舍地上下求索。这曾导致他走向社会主义、政治行动主义、怀疑论、淡泊的超然态度、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冷战的批评者、社会自由派，最后使他产生了感情上的突变，奋起反对他所认为的帝国野心。他希望美国能追求自身的崇高理想，他孜孜不倦地提醒他的读者们要牢记这些理想。

他是一位导师而不是一名布道者。正如他有一次写道，他知道，如果一个说教家“要在他的同伴中做一场宣讲，那么他必须为自己规定这样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要比发号施令远为卑谦平和，而且要比规劝教诲远为困难重重，即：他必须要能够预先估计到他的同伴们对于他们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洞察力，而且能够对之加以补充”。

尽管李普曼的一部分身心受到了诱惑而脱离世界，去建筑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但他还是同这种诱惑进行了搏斗。他向自己挑战，他同他的守护神厮杀得难解难分，他有意追求这样一种生涯，这种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而且每天都把他暴露在他的敌人面前。这对于一个回避进行个人纷争的人来说，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的。

李普曼之所以没有退出战斗，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即政治问题事关重大，人可以生活得有意义，而且那些具有特殊天赋和理解力的人有责任尽其所能来照亮前程。有一次，他在称赞一位颇有名望的报纸编辑时写道：“凡是认真负责的评论，其标志并不在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旁观者那样对事件做出评价，而在于要充满想象地深入角色做一个行动参与者。所谓责任，就是要分担那些指导下一步行动的人的重担，或者是分担另一种重担，即要胸有成竹地提出另一种行动方向。”

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这就给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无法解决的紧张。他是个复杂的人，远比那些仅仅根据他文章中极为自信的调子来了解他的人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他身上发生着精神的搏斗，这种精神他从未能够充分驾驭，这种精神的冲突欲望他从未能够加以平息。李普曼年轻时，曾经赞赏备至地描写过H·G·韦尔斯；他自己就像韦尔斯一样：

他似乎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他受到自己梦想的挑战，这种梦想对现实中的妥协极为反感；他同时又受到现实的打击，这种现实对一切梦想的空洞无物极为憎恨。

他似乎正在这种搏斗中耗尽自己的心血，这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激烈的搏斗。他似乎依靠一种不断更新的努力来赢得这场搏斗，依靠这种努力，他拒绝沉沦到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世界，也不因自己的虚幻想象而自满自足。

正如李普曼有一次谈到自己时所说的，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前朝遗老，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历次革命以前的幸存者……，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时代，而工作和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童年的一切都没有准备让我生活在狂暴而混沌的时代，也没有准备让我面临人类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急剧变革”。一个童年时代在煤气灯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中央公园乘羊拉车的人，经历了精神分析学的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核裂变和疯狂的民族主义，他终其一生都在力图理解这些革命，都在帮助他的同胞们“适应现实”。



# 目 录

“世界传媒大师”丛书出版总序 赵凯 .....	V
中文版序一 新版缘起 吴晓波 .....	VI
中文版序二 理智与情感 许知远 .....	IX
译者的话 .....	XII
序 赫赫声名开万户 .....	XIII

## 上部 (1889-1931)

1 独生儿子 .....	3
2 哈佛生涯 .....	11
3 民众之友 .....	21
4 揭发黑暗 .....	30
5 离经叛道 .....	40
6 名望声誉 .....	52
7 自知之明 .....	67
8 虚伪中立 .....	80
9 战时总统 .....	90
10 投笔从戎 .....	103
11 咨询班子 .....	114
12 军中宣传 .....	125
13 并非和平 .....	137
14 人世图景 .....	151
15 惹人注目 .....	165
16 顶楼君王 .....	175
17 大众暴虐 .....	189
18 号角无声 .....	197